

在广州的非洲裔移民行为 的因果机制*

——累积因果视野下的移民行为研究

梁玉成

提要:本研究通过研究在华非洲裔外国人国际迁移行为的因果机制,来验证国际迁移理论,尤其是累积因果理论。针对广州的非洲外国移民属于隐藏的小群体,故采用受访者驱动抽样(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方法。实证量化研究发现,2005-2011年来华在广州的非洲裔外国人迁移(非法居留)行为具有国际移民早期阶段的发生特征,移民社会资本累积因果效应不断加强。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稳定,后续的非非法移民将不断加强和拓展。建议在现阶段,政策上应通过抬升来华非洲裔外国人的社会阶层,抑制流入者的阶层下降速度和规模。

关键词:非洲裔外国人 移民 非法居留 累积因果理论 受访者驱动抽样

一、研究背景

中国经济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出口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不断增加,导致进入中国的外籍人员数量持续增长。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和广东聚集的外国人占全部国际移民人口的 62%,其中广东所占人数最多,超过全国的 1/3;且不同于北京和上海的是,聚集在广州及其周边城市的外籍人士中,非洲裔的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在广州为核心的区域大

* 本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在穗非洲裔外籍移民的隔离与融合研究”(10YJA840021)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 2010 年度项目(GD10CSH04)的成果。调查获得广东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和佛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支持。研究得到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以及挪威外交部的资助。赵延东教授在调查方法上给予作者很多技术帮助;与蔡禾教授的讨论使作者获益匪浅;审稿人的意见使得本文品质得以提升,特此一并致谢。

量非洲裔外国人流入并滞留下来,其中出现了非法居留、非法入境和非法就业(官方简称“三非”)问题。

纵观很多发达国家的移民史,外来移民问题最开始都是一个边缘性的社会问题,但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影响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关键性社会问题(Peter, 2001)。几乎所有的当今发达国家基本都面临着移民和非法移民造成的大量社会问题,因此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着手了解外来移民的来华规律及其影响因素越早越好。

二、国际移民理论及其在发展中国家反思

(一)国际移民的宏观理论

移民宏观理论有推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并非盲目无序的流动,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左右人口迁移的动力是推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推力”指原居地不利于生存和发展的种种排斥力(如因战争、动乱、天灾、生态环境恶化等使某一小群体遭遇的意外或不幸),迫使人们离家出走;“拉力”则是指移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不一定是迁入地的条件比迁出地优越,而是具有较多的谋生和发展机会,或是对某一小群体的特殊机遇。推拉理论着眼于迁出地的消极因素和迁入地的积极因素对迁移者的影响(Petersen, 1958)。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称“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Massey, 1995)。它从分析发达国家的市场结构入手,认为发达国家形成了双重劳动力市场:具有高效益、高保障、高福利、工作环境舒适的高级劳动力市场和低工资、不稳定、缺乏升迁机会、工作环境恶劣的低级劳动力市场。前者很容易招募到工作人员,本地劳动力趋之若鹜;而后者则缺乏吸引力,本地劳动力不屑从事。这就使得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对国外劳动力的内在需求并促进了人口的跨国迁移。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学说,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对国际移民的推动作用。它认为跨国移民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扩展、渗透,边缘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因此发生剧变并融入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经

济中,由此,传统生活方式难以为继,大量人口从原来封闭的社会迁移到其他地方,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跨国移民(沃勒斯坦,2006)。

(二)国际移民的微观理论

解释移民行为的微观理论包含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社会资本、社会网理论和累积因果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国际移民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择,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其根源在于国家间的工资差距;而人口的流动可以消除这种差距,最终促使移民现象消失(Stark & Bloom,1985)。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国际迁移的可能性与个人的年龄、性别、教育和技能,以及工作经历和婚姻状态有关,个体为了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的回报,会冒险改变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Grubel & Scott,1966)。新经济移民理论提出,导致迁移决定和行为的,不是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绝对收入的差异,而是行动者与参考群体比较之后得出的相对剥夺感(Stark & Taylor,1989,1991)。新经济移民理论打破了传统的“将个人处于社会真空”的迁移理论模型,挑战了出发地的市场作用的假设,将出发地市场竞争的不完善和垄断所造成的市场失败作为原因机制。移民网络理论提出,移民和原居地的亲人、朋友,基于亲情、友情等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特殊联系,“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Greenwood,1971;Nelson,1976;Massey et al.,1987);强调移民在出发社区和到达社区的网络关系的作用。移民的社会网有四个方面的作用:提供信息,降低迁移成本;降低文化适应的难度;帮助新到达的移民找到工作,并提高他们对收入的预期;帮助新来的移民节省各类开支。

梅西等人在移民社会资本理论上提出了累积因果理论(Massey et al.,1987;Massey,1988,1990a,1995)。他们认为,当移民网络形成后,一方面,移民信息可能更准确、更广泛地传播,移民成本可能因此降低,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向国外特定地区定向移民可能融入出发地的乡俗民风之中,而不再与早期特定的经济、政治条件相关,更多的是由移民网络的联系程度以及在移民网络中积累的社会资本等因素所决定的。移民过程获得自行发展的内在机制,产生自身延续性(self-perpetuation)。移民网络虽不能解释移民最初的发生,却可以说明它的绵延不绝,并有助于预测未来的移民动向。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其他因素都慢慢变得不再重要,而移民出发地的移民网

络可以自我演进、累积,并且认为移民行为有内在的自身延续性,当移民行为内化为超越意识控制的、具有衍生性“习惯”时,即使产生最初移民行为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被局外人断定为非理性的移民行为在该群体内仍会获得认可而得以延续;每一次迁移均会影响迁出国和迁入国双方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而不断的增强后续的迁移。

移民网络涉及到移民从出发地到流入地的网络连接,以及移民在流入地的网络状况。网络连接随着时间的累积而对移民出发地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会迁移到目标国,这使得目标国和迁出国的连接日益增加。移民在目标国生活的时间越长,其能够提供给潜在的移民的信息和资源的质量也越高。基于迁移的累积因果理论,梅西(Massey, 1990b)提出了在早期迁移阶段的阶层下移现象。他考察了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发现在移民的早期阶段,移民往往是中间阶层成员,比之于低下阶层他们支付得起昂贵的国际迁移费用,比之于高阶层他们有迁移增加发展机会的需求;但是随着迁移过程中社会网络的成熟,迁移成本会逐渐下降,在迁移的累积因果作用下,出发国迁移的阶层出现下移的趋势。

最后,必须提及梁在等人(Liang et al., 2008)对累积因果模型的批评。他们指出,首先,该模型更适用于讨论出发地是农业社会的条件下——即缺乏城市经济特征的情况下的移民外流的情况。因为农村更多的是同质性的熟人社会,易于存续社会网络;而城市更多的是异质性的陌生社会,不宜建立社会网络。其次,累积因果模型对数据的收集有移民的社会网或者社会资本,是指移民在出发社区和到达社区的网络关系,并往往用移民在出发前与到达地的连接数量作为测量指标。累积因果模型对数据的收集有较高的要求,在实践研究中一般需要追踪数据,使得研究上的难度增加。

对于累积因果模型,我认为还应该提出一个批评。即累积因果模型主要是讨论那些存在着迁入地—迁出地连接的迁移。对于那些不能存续迁入地—迁出地连接的迁移,如那些源于非经济原因、尤其是政治原因,如反政府等政治因素而进行的迁移中,因为难于存续迁入地—迁出地连接,因此该理论也未必适用。

(三)国内相关研究

中国学者近年才开展有关发生在中国本土上的外来国际迁移研

究。李志刚等学者(2008,2009)使用“跨国社会空间”概念,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广州小北路非洲族裔经济区的形成机制。他们观察到非洲族裔在广州采购货物,回本国销售,其经济活动均在自己的种族中。因此提出,广东的外向型经济是其外部条件,内部族裔网络是其运作的主要形式,小北路的非洲族裔经济区是一种特殊的移植性社区。许涛(2009b)的研究同样着眼于非洲人的社会网络关系。他提出,在广州的非洲人通过强化和重构其在广州的社会关系重构了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其内核为情感联系的亲属关系,外部为利益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他们的研究都集中在分析非洲裔外国人在华的生存策略和逻辑,对于更加完整的非洲裔外国人来华的迁移机制则没有涉及。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抓住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这个关键机制,但是对这个机制是如何影响了非洲裔移民来华,以及作出在华移民居留的决定的问题则没有回答。

(四)理论反思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既有研究的跨国移民现象多发生在既是移民也是发达国家中,而中国是一个既非移民也非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这就使得用于解释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从劳动力富集国家向劳动力贫乏国家迁移的宏观理论缺乏解释力。作为非移民国家,中国原有的制度安排基本上不允许一般外国劳动力在中国就业,这也使得移民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经济移民理论难于解释大量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的非洲裔外国人不断迁移来华的现象。

累积因果理论提出,移民的社会网络可以自我演化、累积,并导致移民输出地的潜在移民对移民后果具有更高的预期。该理论在对发达国家的移民现象研究中被很多实证研究所证实——移民的倾向性是移民的出发地的社会环境的函数,并且随着不断移民的出现,在不断地强化移民的倾向性。于此理论中,个体的特征对于预测其移民倾向性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其在出发地和抵达地的社会环境,且对后期选择迁移的行动,个人特征日益变得不再重要。

因此,本研究认为,累积因果理论更适宜于解释我国目前的处籍人口来华的移民行为,并试图验证该理论对来华非洲裔外国人的迁移行为的因果机制的分析的有效性,试图揭示该理论模式下,来华非洲裔外国人的迁移社会空间的生产逻辑和迁移行为的因果机制。

三、广州和佛山的非洲裔外国移民的数据收集方法

(一)操作化测量

每年进出的非洲裔外国人超过30万,到底哪些是最终选择居留下来的移民?由于我国并非一个移民国家,只有很少的人得到了长期(永久)居留身份,所以不可能以“是否获得长期(永久)居留身份”作为是否移民的操作化测量。

通过考察主要移民国家对于入籍的要求,主要有两点:时间和意愿,即申请时一般要求在入籍国,并且有自主意愿入籍(萧敬,2006)。据此我们在本研究中的操作化定义是,将选择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国人看做是来华的非洲裔国际移民。这个定义的合理性在于:在一个非移民国家中,移民缺乏官方的合法身份认定机制,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否认这个现象的存在。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很多来华的外国人,即使在华时间很长,也不一定长期在华居留的意愿,因此,是否非法移民的测量包含时间维度和意愿维度。^①

(二)数据收集情况

近些年,一方面,大量非洲人在广州的“三非”问题,使得警方采取了多种治理手段,非法居留者一旦被查获会导致高额的罚款、遣返回国,甚至面临牢狱之灾;另一方面,大量关于非洲人在粤的负面信息的传播也导致本地居民对他们的排斥。这也造成了非洲社群对广东本地政府机构和本地居民的相互不信任(李志刚等,2009)。因此,对在广州的非洲人使用常规调查方法在实践上很困难,即使勉强完成,往往获得的也是存在很大偏误的样本。

1997年道格拉斯(Douglas,1997)提出了针对少数和隐藏群体的受访者驱动抽样调查法(RDS)。该方法建立在社会学中行动者是通过网络连接这一社会网络基本原则之上,对传统的滚雪球抽样方法进行

^① 这是本研究的一个关键点,依此操作化定义,我们可以前瞻性的研究非洲移民的来华规律。但仔细推敲这个定义,仍存在一定瑕疵,主要是:(1)将那些合法居留且具有移民意愿的人排除在外;(2)将由于某些原因想离开中国而不能离开(如经济失败,负担不起离开费用)的人纳入了移民计算范围。但是由于中国是非移民国家,尚没有官方定义,只能暂时以尽量接近目前经验的尺度而作此操作化界定。

了改进。该方法的每一轮滚动的设计使得招募满足一阶马尔可夫过程 (first-order Markov process), RDS 抽样方法得到的一阶马尔可夫链收敛速度很快,可以迅速获得达到均衡状态的样本。根据 RDS 获得的样本可以对总体特征做出可靠的推论。RDS 方法历经数次改进 (Douglas, 2002, 2007; Salganik & Douglas, 2004), 形成了适用于对规模和边界不太清楚、不愿意暴露身份的隐藏和稀少人口的抽样、分析和研究的方法 (赵延东, 2007)。

非洲各国虽然语言不同,但其官方语言往往是英语或法语,故此次调查使用的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法语。^① RDS 招募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寻找种子 (第一位接受调查者)。种子接受完调查之后,介绍其他合格被调查者来接受调查,被介绍者完成调查后又继续介绍新的合格被调查者,按这样的方法样本像滚雪球一样逐渐增大。本次针对在广州的非洲裔外国人的调查自 2011 年 7 月 10 日开始,8 月 6 日结束。

为了激励滚动和减少被调查者偏倚 (bias), RDS 方法采取双重激励——对招募者和其招募来的被调查者均给予物质奖励。我们给每位参加过调查的招募者均发给 3 张招募券 (coupon), 其招募来的被调查者以此作为凭证参与调查。反复以上过程,直到达到满足研究需要的样本量。招募链最长 9 级,招募调查对象 656 名。

我们在广州两个均有大量非洲裔外国人聚居的区域开展了 RDS 方法的数据收集。A 调查地点选在非洲人大量聚居的住宅小区,该小区位于城市中心区,商业、交通发达,是外国人管理模范小区,其租金也高于附近同层次小区;其中居住的非洲裔外国人多是合法居留、经济能力较高的人员。B 地点所在的社区是一个 20 多年前形成的商业小区,位于城乡结合部,是很老的商业小区并显得很破败,生活成本很低,政府部门对其监管较为松散,B 小区的房租成本大概只有 A 小区的 1/3。由于调查涉及非法居留者,本研究非常谨慎地处理了所涉及的伦理责任。^②

① 在调查期间,法语调查员共有 10 名,英语调查员共有 9 名。在正式调查中出现过 2 位讲阿拉伯语的合格被调查者,但是由于没有准备阿拉伯语翻译,所以无法完成访问。

② 非法移民是身份敏感的群体。在调查期间,有关监管部门同意为了不影响调查的可靠性和样本代表性,保持原来的执法模式,并在调查期间对调查场所及其附近减少常规巡查数量,以促成非法移民可在安全的情况下接受调查;同意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任何个体资料均仅供作者做研究使用。所有参与者均被告知其个人资料仅作学术研究在统计层面使用,并保证其个人资料的安全和隐密,研究者对其疑问给予了仔细的说明,合格的被调查者均在理解并给予口头同意的情况下才进行调查。

图1给出了A和B两个调查点的RDS招募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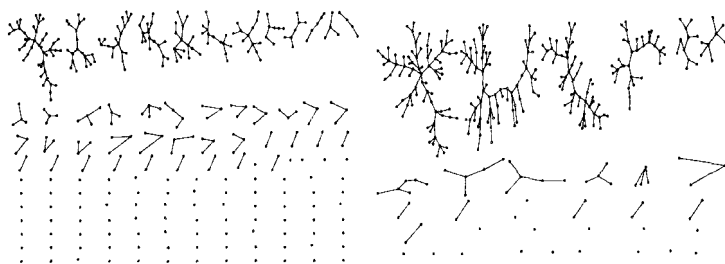


图1 A地点(左)和B地点(右)的RDS招募链

在图1中,代表被调查者的点有两种——实心点和空心点。实心点代表合法居留者,空心点则代表非法居留者。图中显示A调查地点相对于B调查地点包含较少非法居留者,而B调查点则有大量的非法居留者。图中清晰的表明,拥有更多非法移民的B调查点的非洲裔外国人,其网络发育相对更充分,招募链更长,种子发芽率更高。

图1显示,RDS方法在这两个区域的招募链有着不同的形态。具体而言,A调查点相对于B地点的非洲裔外国人具有更低的社会网络链接密度。在A地点的调查中89位被调查者没有帮助我们招募新的被调查者,占A地点全部被调查者的25.5%;而在B调查点仅有14位被调查者没有帮助我们招募新的被调查者,仅占B地点全部被调查者的4.5%。

四、在广州的非洲裔移民的基本特征及探索性描述

研究由RDS方法获得的样本,根据不同招募轮次之间的转换矩阵进行迭代,并配之以每个个体的网络规模来修订招募造成的选择偏误,最后得到总体特征。具体计算公式可参考有关文献(Salganik & Douglas, 2004; Goel & Salganik, 2009),本研究使用Stata软件中专门分析RDS数据的命令来实现(Schonlau & Liebau, 2012)。

(一)地区分布

调查显示,在广州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国人,主要来自于非洲西部,占全部非洲裔外国人的近70%(见表1)。

表 1 RDS 方法推论获得的地区分布总体特征 (N = 656, %)

| 地 区 | 合法居留 | 非法居留 | 总计 |
|------|--------|--------|-------|
| 非洲东部 | 21. 13 | 3. 95 | 10. 5 |
| 非洲南部 | 15. 69 | 6. 08 | 7. 1 |
| 非洲西部 | 35. 29 | 76. 90 | 69. 6 |
| 非洲中部 | 27. 89 | 13. 07 | 12. 9 |
| 合 计 | 100 | 100 | 100 |

(二) 样本基本特征

表 2 给出了基本的样本特征, 以及使用 RDS 方法获得的总体特征。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在广州的非洲裔外国人的特征: 年轻人为主; 女性比例低于男性; 主要来源地是非洲西部; ①非法居留比例接近 40%; 绝大部分人是持商务签证进入中国; 讲英语的比例为 82%, 法语的比例为 18%; 教育程度普遍在高中及以上。

表 2 样本基本特征和 RDS 推论获得的总体特征 (N = 656)

| 变量 | | 构成比例(%) | | 变量 | 构成比例(%) | | |
|----|-------|---------|--------------|-------|---------|--------------|--------|
| | | 样本点估计 | RDS 方法推论总体特征 | | 样本点估计 | RDS 方法推论总体特征 | |
| 性别 | 男性 | 80. 7 | 66. 7 | 语言 | 英语 | 72. 68 | 81. 73 |
| | 女性 | 19. 3 | 33. 3 | | 法语 | 27. 31 | 18. 26 |
| 教育 | 文盲 | . 6 | 2. 4 | 年龄(岁) | 10 - 19 | . 5 | . 4 |
| | 小学 | 3. 8 | 6. 6 | | 20 - 29 | 39. 7 | 38. 4 |
| | 初中 | 19. 5 | 21. 2 | | 30 - 39 | 47. 6 | 44. 5 |
| | 高中 | 28. 3 | 31. 6 | | 40 - 49 | 10. 6 | 12. 3 |
| | 大专及以上 | 47. 8 | 38. 2 | | 50 及以上 | 1. 6 | 4. 4 |

① 我们这里使用非洲、或者非洲次分区的概念, 更多的是地理上的临近和经济上的接近。本文指涉的在广州的非洲裔外国人是一个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群体。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迥异, 文化和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异。在调查过程中, 经常有被调查者强调自己是非洲某国人, 与附近的某国人是不同的, 强调自己国家的人具有某些优良品格, 而对比的那个国家的人则不具备。

续表 2

| 变量 | | 构成比例(%) | | 变量 | 构成比例(%) | | |
|--------------|------|---------|--------------|-------------|-----------|--------------|------|
| | | 样本点估计 | RDS 方法推论总体特征 | | 样本点估计 | RDS 方法推论总体特征 | |
| 来源区域 (非洲) | 东部 | 15.4 | 10.5 | 签证类型 | 旅游签证 | 15.7 | 14 |
| | 南部 | 14 | 7.1 | | 商务签证 | 75.8 | 78 |
| | 西部 | 45.8 | 69.6 | | 工作签证 | 1.7 | 1.2 |
| | 中部 | 24.8 | 12.9 | | 学生签证 | 6.8 | 6.6 |
| 在华居留状况 | 合法居留 | 65.4 | 60.7 | 来华时间 (年) | 1995-2007 | 18.1 | 21.2 |
| | 非法居留 | 34.6 | 39.3 | | 2008-2009 | 28.2 | 30.3 |
| | | | | | 2010-2011 | 53.5 | 48.5 |

(三) 迁移的风险函数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提出在一个非移民国家中,应该将移民的操作化定义为是否具有非法居留身份。这个定义有利于我们研究当其身份由合法居留变为非法居留时,将其看作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转变的“事件(event)”,即确定性的迁移行为的发生。这样我们可以使用事件史模型(Event History Model)来分析迁移的风险函数。在估计中,我们假定其他一切自变量都暂时为0(Kalbfleisch & Prentice, 1980)。由于没有任何非移民国家非法居留者行为的先验知识,我们不对持续合法居留的时间分布有假设,也就是在其他条件一致下,个体选择非法“居留”下来的风险率和时间并无特定的函数关系,故将采用非参数估计方法中不假设数据的分布的卡普兰-迈耶(Kaplan-Meier)方法。

存活函数(survival function)是观察对象的生存时间大于某时刻的概率,它代表了来广州的非洲人随着在华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大的非法居留的状态,即在刚来广州时,其合法居留的存活率都是1,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开始出现非法居留现象,合法居留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存活函数为不对称的单调下降的偏斜分布。卡普兰-迈耶方法的计算生存率随第一次来华时间的分布见图2(左)。

图2显示出两个特征。首先是在大致12个月的阶段的陡降,也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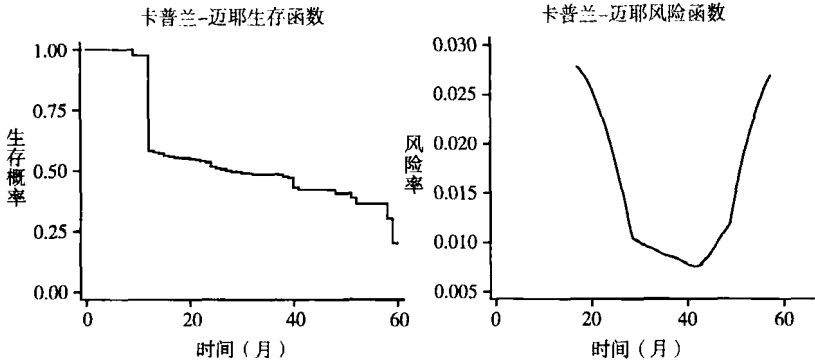


图2 在广州的非裔外国人的(非法)移民生存函数(左)和移民风险函数(右)

是说有相当多的非洲裔外国人是在来华后直接选择了非法居留;^①其次是在40个月的后半期,生存函数的斜率有更大的下降趋势。

为了更清楚显示生存函数不能显现的部分,我做了非法居留的风险函数,以描述来广州的非裔外国人在各个时间点上非法居留的概率(见图2[右])。总体上,非法居留的风险呈现出U形结构,而不同来华时间点上变成非法居留的概率是不同的,其中早期概率很大,其后概率不断下降,但是在来华3年后,非法居留的概率又开始持续上升。

无论是存活函数图还是风险函数图,均显示出部分非洲人来华之初就有非法居留的决心和行为,随着他们在华时间的持续,这些人越来越少,但是大致到了3年半后,非法居留的概率又上升了。定性访谈显示,这是因为选择合法居留的成本高于非法居留,并且他们已经适应了在华的生活,认同了生活和工作重心移到中国之后的理性选择。查遍国际学术界对迁移风险函数(migration-hazard function)的研究,只有迁移风险与居留时间之间呈现出单调下降的函数形式,完全没有发现如本研究一样获得U形的迁移风险函数的报告。应该说,这是非移民国家中才会出现的特有的迁移风险函数形式。^②

① 现在的国际非法移民,在入境时往往选择风险低的合法入境,而在入境之后,当超出居留期限时再选择非法居留下去。在操作定义上,为了与公安部门所认定的恶意非法居留保持一致,我们设定入境后最后一次合法延期签证后12个月仍然没有离开为非法居留;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我们认定其为合法居留。这一操作化界定,并不会导致12个月内的非法居留者的累积报告,显示的仍然是一入境后就选择非法居留者的数量。

② 如此风险函数形式已经不是常见的风险函数分布形式了。在凯佛(Keifer, 1988)总结的各种随时间变化的风险函数分布中,没有任何一种属于本研究所发现的形式。

(四) 累积因果效应存在的初步证据

梅西(Massey, 1990a, 1990b)将跨国移民看做是一个动态的自我增强的过程。移民网的降低迁移成本作用,随着时间的演变不断增强,最终将帮助越来越低下的阶层中的个体迁移。因此,如果移民的累积因果理论是可以正确描述中国刚刚出现的来广州的非洲裔外国人这样一个移民早期阶段的作用机制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可以观测到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中存在的网络关系的效用不断增加、迁移成本不断降低、迁移来广州的阶层不断降低等现象。

1. 社会资本及其效应上升的证据

从社会资本角度通过简单的曲线拟合,分析族裔经济和族裔居住最核心的社会资本的测量——不同时间来华的非洲人来华时是否有人接待、认识的祖国人数等简单的拟合显示,均随时间发展而不断上升;而迁移的后果,以及导致未来迁移继续发生的累积因果效用——对家乡亲人的经济有所改善、带家乡的亲友来华的比例随时间发展也显著上升;另外,累积因果理论所预测的社会网络降低迁移成本也在办理延期的中介费随时间发展不断下降得到验证,即社会资本的确降低了迁移成本(参见图3、4、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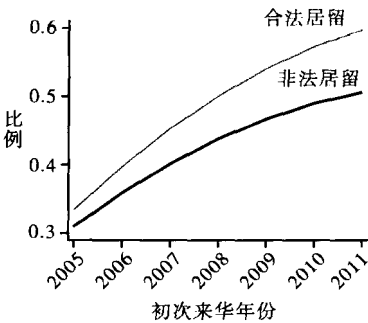


图3 社会资本分布 (第一次抵达中国时亲人朋友接待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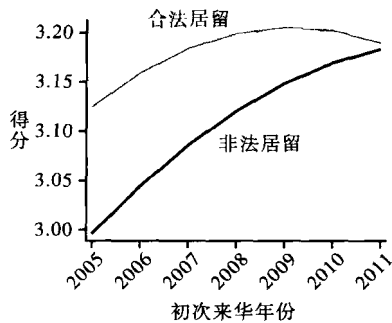


图4 居住社区中中国人的数量

2. 迁移过程中的阶层下降效应

简单的曲线拟合显示,我们的确观测到累积因果理论所预测的阶层下降现象:无论是合法居留还是非法居留,随着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

的不断建构,来广州的风险和成本都在下降,导致了来广州的非洲裔外国人的社会阶层不断地下降(参见图7、8、9、10、1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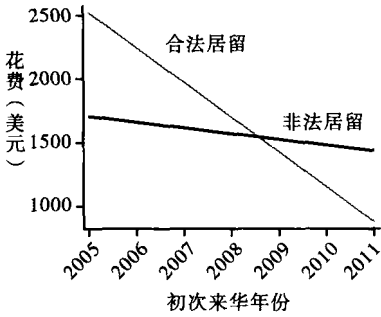


图5 通过中介办理签证延期的平均花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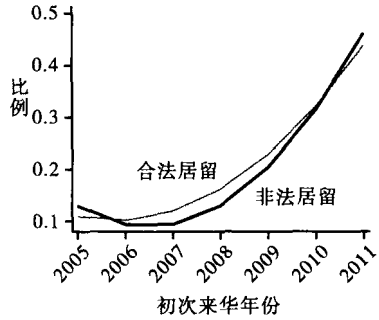


图6 带领或介绍亲友来华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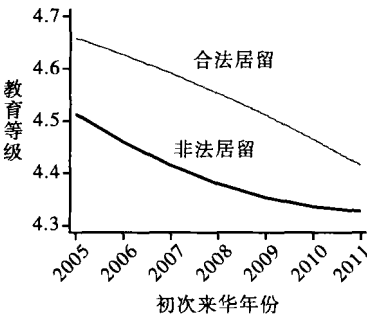


图7 教育等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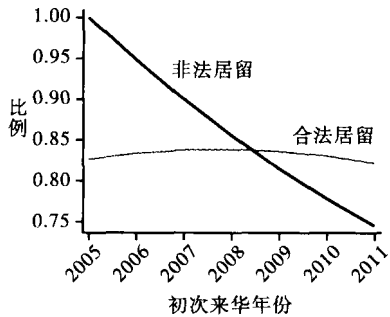


图8 家人是否有跨国工作居住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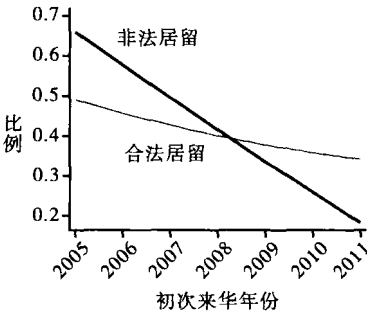


图9 家人是否有在华工作居住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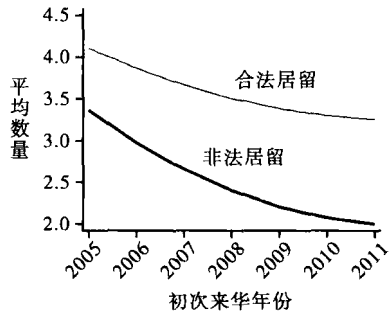


图10 第一次来中国前去过的其他国家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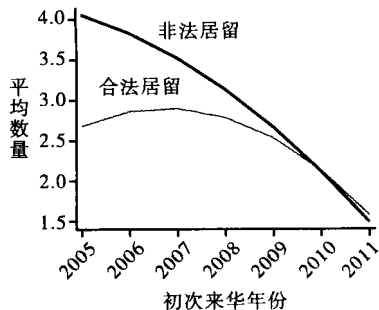


图11 第一次来广州前去过的其他中国城市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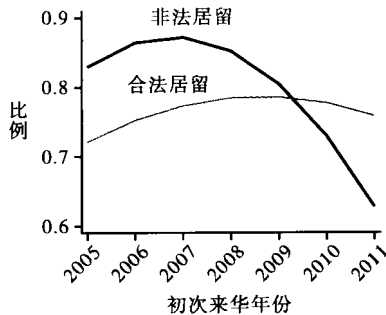


图12 来自大城市的比例

六、有关研究假设及其验证

(一) 研究假设的提出

据以上的探索性描述,我们基本确认了来广州的非洲裔外国人目前还处于移民的早期阶段,移民的累积因果理论所预测的无论是阶层下移还是社会网络累积效应都可以从收集的样本中观测到。为了进一步分析移民的累积因果理论对来广州非洲裔外国人的具体作用过程和作用机制,我延续梅西的研究,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角度提出研究假设。

一般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往往预言人力资本会有助于增加国际迁移的概率。但是,多位研究墨西哥到美国移民的学者的工作均发现,以教育形式测量(undocumented migrant)的非法移民人力资本对迁移选择的影响是负的(Massey et al., 1987; Taylor, 1986, 1987; Borjas, 1994)。显然,对于非法移民而言,无论在原有国家教育程度如何高,都不能帮助他们依靠其教育文凭在迁入地初期顺利地寻找到高报酬的工作,而只能从事一些低技术工作。中国是一个非移民国家,因此并不存在移民的劳动力市场,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国人也就无法依靠其教育文凭寻找到理想的工作。因此,以教育为测量内容的人力资本应该不会有增加移民的概率。考虑到来广州的非洲裔外国人的普遍教育程度不高,因此我们提出一般人力资本(教育)假设:

假设 1.1,一般人力资本无效性假设:随着迁移的过程继续,一般人力资本逐渐失去对移民迁移行为的预测能力。

显然,除了教育这样的一般人力资本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形式的人力资本,即迁移人力资本(Migration-specific human capital)。迁移人力资本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迁移过程人力资本,即指帮助移民从出发地到达目的地的知识和信息的掌握能力;另外一个奇西克(Chiswick, 2008)提出的“目的地人力资本(destination-specific human capital)”,该概念主要是指移民在目的地的生活、工作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的掌握能力。^①它们一起构成了迁移人力资本并发挥着和一般人力资本不一样的功能,因此我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2, 迁移人力资本的有效性假设:随着迁移过程的继续,迁移相关的人力资本仍然对移民迁移行为具有预测能力。

我们在前面已经初步证实,来广州的非洲裔外国人,尤其是其中的非法居留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网络关系的效用不断增加、迁移成本不断降低、阶层不断下移,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累积因果理论可用以较好的分析移民来华迁移的机制。然而,中国是一个非移民国家,来广州的非洲裔外国人作出非法居留决定大致要涉及到几个环节。首先是在出发地,潜在移民需要有能力通过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帮助其获取有关中国的知识和信息;其次是其所处的地区的社会网,这个网络是能够联接出发国和目的地国交往的网络,会起到帮助其降低迁移过程的成本的作用。作为一个潜在移民的生活场域,显然这个网络会对其决定施加影响,即影响他是否移民的决策,以及其抵达目标国后,能否帮助他适应生活和工作的需要,并最终决定是否真的选择非法居留下来。

在梅西 1994 年发表的研究中,他并没有区分以上过程,他仅仅测量了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父母、兄弟姐妹是否迁移到目标国)和出发地的社会资本存量(出发地社区移民到目标国的人口比例)。而中国作为一个非移民国家,在广州的非洲裔外国人选择是否非法居留下来,

^① 在奇西克(Chiswick, 2008)的理论中,在抵达之前目的地人力资本没有作用,一旦抵达目的地,该人力资本即时发挥作用。作者对奇氏的这个理论判断持批评态度。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中文掌握情况作为目的地人力资本的测量。显然,掌握中文是有助于潜在的移民作出迁移决定的,并非如奇氏所认为的只有在抵达时才发挥作用。其他学者对该概念的操作化测量,如梅西使用是否有去过目标国家、是否在目标国家工作过等,显然会影响移民在出发国作出迁移的决策,而非如奇氏提出的只有在抵达目的地时人力资本才发挥作用。当然,即使读者反对我的批评,由于我研究的对象都已经来华在广州,所以我的研究并不违背奇氏提出该概念的理论假设。

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资本就是目标国的社会资本。

已有的文献提出,出发地中那些居住在高迁移率社区比低迁移率社区的人具有更高的迁移概率,原因在于社区存在的移民社会网将会从提供迁移过程的信息、在抵达地寻找工作、租房等方面帮助潜在的迁移者。显然,累积因果理论是从一个较长期的角度来分析移民过程,而中国刚刚出现这个过程,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迁移的早期阶段,行动者往往与移民社会网中的帮助者是强关系时才能得到帮助,从而实现迁移;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出发地的移民网络日益发达,这样才逐渐演变到即使是弱关系,行动者也可以获得帮助。因此,个体在出发地的社会资本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没有预测能力。而与此同时,出发地社区的社会资本中的移民社会网络的预测能力则越来越强。

选择在中国非法移民有着严重的法律后果。^①因此,在这样的外部约束情况下,潜在的迁移者选择非法移民必须有较大的信心相信自己可以是例外;而能够给新来者以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的,只有目的地的移民社会网络。根据移民的累积因果理论,在目标国居留时间越长,就越了解目标国的信息、规章制度、潜在的执法漏洞等。因此,我预测,抵达地社区的社会资本中的移民社会网络的预测能力会越来越强,就此我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 2.1,个人社会资本无效性假设:随着迁移过程的继续,个人掌握的社会资本逐渐失去对移民迁移行为的预测能力。

假设 2.2,出发地社区社会资本有效性假设:随着迁移过程的继续,外在于个人之外的出发地的社区社会资本仍然对移民迁移行为具有预测能力。

假设 2.3,目标地社区社会资本有效性假设:随着迁移过程的继续,外在于个人之外的目标地社区社会资本仍然对移民迁移行为具有预测能力。

由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所以非洲裔外国人的经济资本越高,便有越低的迁移来华概率。同时,累积因果理论所预测的阶层下移现象,也促使我提出经济资本反作用的假设 3:

① 法律后果包括罚款、遣送回国,直至坐牢;同时会并被登记在黑名单中,若干年内不能再获得来华签证许可。被登记在黑名单中意味着移民在华经营的网络关系和生意来往的断裂,往往导致许多年来的辛苦积累全部失去。

假设3,经济资本反作用假设:行动中的经济资本越多,将降低其迁移的概率。

(二)基于 RDS 数据的离散重复事件史数据分析方法

我们以“月”作为观察到的时间间隔。在每一个离散的时间段(本研究的“月”)内,以一个哑变量来标识事件是否发生。离散时间段被累计直到事件发生,或者被删节,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混合截面时间数据(pooled data)。这样的数据就可以使用分析哑变量的模型,而时变和非时变变量都可以很轻松地置放在模型中(Singer & Willett, 2003)。我们这里用的只是一个近似的风险率模型,因为模型的因变量是发生比而不是风险率,此发生比是时间变量和其他变量的函数。

我们之所以使用多层次模型,是缘于 RDS 收集数据的相对优势。现实生活中人们是在不同的网络群中,如尼日利亚族裔群落、基督教群落、五金商人群落等。使用 RDS 抽样方法必然会出现与招募者属于同一群落的个体具有更大的被招募的概率。因此,该方法在获得样本的过程中,每一个招募群组就一定会具有社会网络的固有群聚性(inherent homophily),也就存在着不可观测的组特征,^①因而必须使用多层次模型来消除招募网络带来的方差不独立导致的偏误,控制群体相似的网络特征。此外,由于我设定的模型是研究个体特性(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根据克里斯托弗等(Christopher & Larry, 1994)提出的分析原则,如果样本入样概率是自变量的函数,在分析时有无加权模型得到的都是一致的和无偏的估计,仅在标准误上有较小差别。因此,我们主要考虑使用因变量的人样概率进行修订,即以合法居留者和非法居留者的人样概率的差异来修订模型。^②

本研究引入“迁移(非法居留)风险率”概念,迁移(非法居留)风险率越高,表示特定时间的迁移(非法居留)可能性越高,反之亦然。本模型使用的是随机截距多层次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① 这里,我将那些没有招募新的被调查者,即只完成自己的问卷,并没有帮助我们招募新的被调查者的人,均看作是同一个群组。

② 目前学术界使用 RDS 获得的数据,主要用于做隐藏和稀少群体的总体描述,而做因果分析的研究较少,如佛罗斯特等学者(Frost et al., 2006)很巧妙地使用 RDS 数据获得的交互表来研究因果模型。进行复杂的多元因果模型的分析本文还是初步尝试,可能会有局限性。

$$\begin{aligned} \text{logit}[h_x(t_{ij})] &= \text{log}_e \left[\frac{h_x(t_{ij})}{1 - h_x(t_{ij})} \right] = \beta_{0i} + \beta_1 x_{1i} + \beta_2 z_{2i} + \beta_{31} t_{ij} + \beta_{32} t_{ij}^2 + \beta_{33} t_{ij}^3 \\ \beta_{0i} &= \gamma_{00} + \delta_{0i} \\ \beta_1 &= \gamma_1 \\ \beta_2 &= \gamma_2 \\ \beta_{31} &= \gamma_{31} \\ \beta_{32} &= \gamma_{32} \\ \beta_{33} &= \gamma_{33} \\ \delta_{0i} &\sim N(0, \delta^2_{\mu}) \end{aligned}$$

这里我们分析的是 t 时刻的事件的风险率或者发生比 (hazard or conditional event probability) 的发生规律。我们这里设定为随机截距模型,即不同的群组的基准 logit 风险率 (baseline logit hazard) 存在随机变化。我没有设定为更为复杂的随机系数模型,原因一是有的群组观测个案太少,不足以进行随机系数分析。从多层次模型研究角度,本研究使用的是 2 水平随机截距模型。学者们提出 2 水平随机截距模型的最低要求是:2 水平内的每个单元包含两个观测资料即可满足多层次模型分析 (Gelman & Hill, 2007)。原因之二是这是第一次在中国进行此类研究,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的设定仍需日后进一步深入的理论辨析和探讨。

(三)实证分析结果及其讨论

我们的操作性变量设置为:将时间、个人的人口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时间因为前面探索性研究发现存在拐点,故引入三次项;个人人口学背景变量引入年龄和性别。一般性人力资本变量,引入教育等级,从没有文化到大学共 5 个等级。考虑到被调查者来华主要是进行贸易,故将来华前是否经商作为一个一般性的人力资本的哑变量。与迁移有关的人力资本变量设为:来华前去过的国家数量、来广州前去过的中国城市数量;将中文水平作为目的地人力资本。在经济资本方面,引入出发地是否大城市、家乡是否有住房、投资,以及出发国的人均 GDP 做测量。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设为:家人是否有跨国迁移经历以及是否有来华经历、认识的广州人、祖国人以及非祖国的非洲人数量和来华时是否有人接待。社区层次的移民社会资本中,出发地的社区社会资本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移民到中国是否成为一种惯例,即测量被调查的非洲裔外国人的祖国人中非法居留在中国的比例

是否高;另一个是测量迁移的出发地氛围,由测量其来华出发社区的氛围的两个题目构成,即:来中国的人数量是否多,来华对当地人的生活是否有改善。抵达地社区的社会资本由居住社区的非洲人数量和祖国人数量来测量。

本研究使用了嵌套模型,以验证以上假设的有效性。模型 1 系基准模型,为控制变量、人口学变量和一般人力资本变量和经济资本变量。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迁移有关的人力资本变量,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引入个人社会资本变量,模型 4 在模型 3 基础上引入社区社会资本变量。由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奥运会、2009 年的亚运会、2011 年的大运会都对社会安保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导致 2008 年前后来华的非洲裔外国人面对着不同的制度和经济环境,因此他们的行动逻辑可能不同,故不应将他们视为一个同样的总体。由此,我们对 2008 年前后来华的群体分别做模型分析。结果见表 3。

首先讨论人力资本方面的假设的验证。对于预测非洲裔外国人的迁移(非法居留)行为,一般人力资本的有效性的确很低。即使在模型 4 中有效的“来华前经商”在 2008 年以后也不再显著,假设 1.1 得到验证。迁移有关的人力资本虽然有效,但是其作用机制和假设不同。来华前去过的国家数量越多,越不倾向于迁移(非法居留)行为的发生,显示作为发展中国家和非移民国家,并非是非非洲裔外国人的迁移首选。来广州前去过的中国城市数量则在 2008 年前后有着相反的作用:此前前去过的中国城市越多,越倾向于迁移(非法居留)行为的发生,而此后则相反,这说明了广州警方的执法环境的严苛超过其他大陆城市,使得 2008 年后去过其他城市越多就越不选择迁移(非法居留)广州。综合看,中国作为一个非移民国家,迁移人力资本越多的人反而越不倾向于来中国和来广州。这是一个和以往移民理论相反的结论。

经济资本对迁移(非法居留)行为的反作用假设得到了验证。其中特别有趣的是“家乡是否有投资”。在 2008 年以后,这个负向作用反而消失了,即使家乡有投资,也变得与在家乡没有投资的人一样有相同的来华意愿。因此,非洲裔外国人的来华意愿,不仅由中国社会的经济和制度环境所决定,非洲的状况本身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个人社会资本变量虽然有部分显著,且没有违背理论方向,但是模型 3 和模型 2 的比较,可以使我们知道,增加这部分变量是否有助于理解非洲裔外国人的移民过程。分析显示,在模型 3 引入 6 个变量之后,

表 3 迁移(非法居留)的多层次事件史模型

| 变量名 | 模型 1 | | 模型 2 | | 模型 3 | | 模型 4 | |
|--------------|---------------|---------------|---------------|---------------|---------------|---------------|---------------|---------------|
| | 2007 年 及之前 | 2008 年 及以后 | 2007 年 及之前 | 2008 年 及以后 | 2007 年 及之前 | 2008 年 及以后 | 2007 年 及之前 | 2008 年 及以后 |
| 时间变量(月) | | | | | | | | |
| 在华时间 | .136*** | .148*** | .1336*** | .146*** | .1309*** | .142*** | .147*** | .125*** |
| 在华时间平方 | -.00236*** | -.00300*** | -.000532*** | -.00295*** | -.000478*** | -.00293*** | -.00017*** | -.00251*** |
| 在华时间三次方 | 9.34e-06*** | 1.23e-05*** | 2.25e-06*** | 1.21e-05*** | 1.88e-06*** | 1.20e-05*** | -7.03e-06*** | 1.02e-05*** |
| 个人背景变量 | | | | | | | | |
| 年龄 | -.00188 | .00459 | .00157 | .0102 | .007 | .00989 | -.0263 | .0102 |
| 性别(男性=1) | .532 | .253 | .334 | .429 | .42 | .403 | 2.670** | .469 |
| 一般人力资本变量 | | | | | | | | |
| 教育等级 | -.0791 | -.117 | -.182 | -.0308 | -.193 | -.0705 | .0127 | -.0986 |
| 来华前是否经商 | -.428 | -.157 | -.292 | -.247 | -.403 | -.324 | -1.035* | -.38 |
| 迁移有关的人力资本变量 | | | | | | | | |
| 中文水平 | | | .00197 | -.139 | .00823 | -.144 | .464 | -.111 |
| 来华前去过的国家数量 | | | -.169* | -.257*** | -.167* | -.226*** | -.277** | -.150* |
| 来广州前去过的中国城市数 | | | .213*** | -.098** | .210** | -.0724** | .216** | -.043** |

续表 3

| 变量名 | 模型 1 | | 模型 2 | | 模型 3 | | 模型 4 | |
|-------------|---------------|---------------|---------------|---------------|---------------|---------------|---------------|---------------|
| | 2007 年 及之前 | 2008 年 及以后 | 2007 年 及之前 | 2008 年 及以后 | 2007 年 及之前 | 2008 年 及以后 | 2007 年 及之前 | 2008 年 及以后 |
| 经济资本变量 | | | | | | | | |
| 来自大城市 | .646 | -.402 | .513 | -.329 | .53 | -.318 | .405 | -.283 |
| 家乡是否有住房 | -.422 | -.357 | -.463 | -.26 | -.511 | -.244 | -.792 | -.208 |
| 家乡是否有投资 | -.939*** | -.397 | -.814** | -.328 | -.906** | -.246 | -.685*** | -.267 |
| 出发国的人均 GDP | -.000769* | -.00022 | -.000813* | -.00025 | -.000797* | -.000224 | -.000423** | -.000337* |
| 个人社会资本变量 | | | | | | | | |
| 家人跨国生活迁移经历 | | | | | .448 | -.0765 | .0023 | -.208 |
| 家人是否有过在华经历 | | | | | .039 | -.538** | .0719* | -.370** |
| 认识的广州人数 | | | | | -.00312 | .00167 | -.0014 | .00241 |
| 认识的祖国人数 | | | | | -.000723 | .00732*** | .00251 | .00889*** |
| 认识的非祖国的非洲人数 | | | | | -.000319 | .00741** | .0945 | .659*** |
| 来华时是否有人接待 | | | | | .317* | .0579* | .448** | .252** |
| 社区社会资本变量 | | | | | | | | |
| 祖国人口中非法居留比例 | | | | | | | 3.48** | 1.062** |

续表 3

| 变量名 | 模型 1 | | 模型 2 | | 模型 3 | | 模型 4 | |
|------------------------|---------------|---------------|---------------|---------------|---------------|---------------|---------------|---------------|
| | 2007 年 及之前 | 2008 年 及以后 | 2007 年 及之前 | 2008 年 及以后 | 2007 年 及之前 | 2008 年 及以后 | 2007 年 及之前 | 2008 年 及以后 |
| 来华地的氛围 (来中国人多不) | | | | | | | .327 *** | -.600 ** |
| 来华地的氛围 (是否有改善) | | | | | | | 1.461 *** | .0311 |
| 居住社区的非洲人多少 | | | | | | | .00406 | .00893 ** |
| 居住社区的祖国人多少 | | | | | | | .00351 | .440 *** |
| 常数 | -2.350 ** | -4.90 *** | -2.885 ** | -4.20 *** | -2.884 **, | -4.85 *** | -3.641 *** | -4.001 *** |
| 随机效应(Random - effects) | | | | | | | | |
| 招募组层次 | 1.027 *** | 1.371 *** | .9623 *** | 1.257 *** | .9877 *** | 1.318 *** | .651 *** | 1.248 *** |
| 个体残差 | 1.541 *** | 1.446 *** | 1.2445 *** | 1.368 *** | 1.050 *** | 1.196 *** | .949 *** | 1.022 *** |
| Log likelihood | -265.48 | -726.05 | -243.99 | -718.07 | -242.72 | -710.8 | -211.87 | -623.719 |
| Observations(人月) | 6867 | 7924 | 6867 | 7924 | 6867 | 7924 | 6867 | 7924 |
| 招募组数 | 51 | 108 | 51 | 108 | 51 | 108 | 51 | 108 |
| 观测的个体数 | 116 | 511 | 116 | 511 | 116 | 511 | 116 | 511 |

注: *p < .05, **p < .01, ***p < .001。

比之模型 2, 2007 年前只改善了 1 个似然度, 2008 年后改善了 8 个似然度, 模型均没有显著改善。显示个人的社会资本无效性假设得到了验证。

与个人社会资本变量对模型的改善无效不同, 社区社会资本变量的引入大大改善了模型的拟合度。2008 年前的模型, 5 个变量改善了 31 个似然度; 2008 年后的模型, 5 个变量改善了 31 个似然度和 87 个似然度, 均为显著改善。

社区社会资本变量显示出多重作用逻辑。首先是出发地的社区移民在 2007 年及之前, 其社会资本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但是在 2008 年后受到了抑制。出发地社区的祖国人口中非法居留比例对行动中迁移(非法居留)行为的发生有显著正向作用, 但是在 2008 年后受到了抑制。出发地社会氛围的两个社会资本的测量变量在 2008 年后的作用消失, 甚至成为负向作用, 显示此后非洲裔外国人在广州的处境被如实通过社会网络传达到其出发国, 网络传达的真实信息使得迁移得到抑制。

抵达地的社区社会资本由居住社区的非洲人数量和祖国人数量来测量。模型显示, 中国广州作为抵达地区的移民社会资本的作用, 在 2008 年后得到了加强, 显示非洲裔外国人在此后面面对严苛的环境, 社会资本构建逻辑的改变大大增强了社会资本对其迁移行为的效应。^①

七、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的分析显示, 中国作为一个非移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目前在广州的非洲裔外国人的移民正处于国际移民的早期阶段, 一个跨越中非之间的移民网络正在迅速形成。移民的累积因果理论可以较好的用于分析这个过程。本研究不但验证了该理论所预测的很多现象, 如非洲裔外国人移民(非法居留者)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有效性、个人的人力资本的无效性、逐渐低下的阶层化, 还丰富了这一理论, 如进一

① 本研究专门分析了 2008 年后在广州的非洲裔外国人的社会资本构建, 显示他们在面对更为严格的执法环境下, 改变了其社会交往网络的构建逻辑, 更多的采用了分散居住、更紧密地与祖国人交往等策略来增强其网络的功能。篇幅限制, 这个部分没有涵盖在本文中。

步分析了个人社会资本对迁移(非法居留)行为的作用无效,以及社区社会资本的效应不断上升、社区社会资本构建的变化逻辑和有效性维持逻辑。与移民的累积因果理论所预测的一致,移民社会网络为核心的移民社会资本会使得后续的移民行为得到自我加强和自我演化,并且会随时因应外部环境的需要而改善其构建逻辑,维持且不断增加其有效性。

全球化的贸易分工体系、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本的流动,以及与跨国贸易交织在一起,导致移民及其跨国流动。只要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社会保持稳定,跨国移民将如同滚雪球一样地不断拓展,终有一天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新社会群体。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到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的阶段,老龄化社会初见端倪。纵览世界各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和老龄化都需要通过移民来给予舒缓。我国的社会发展也不例外。随着国家经济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的上升,移民问题将会逐渐从一个边缘性的社会问题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将影响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和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应该尽早开始有关研究工作。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我们建议:对于带来贸易和资本的非洲裔外国人给予更多的居留合法性认定和制度便利;对于与中国低层次外来体力工人竞争的低层次外来体力劳工,给予更严格的执法环境;抬升准入者的社会阶层,抑制流入者的阶层下降速度和规模。

参考文献:

- 李志刚、薛德升、Michael Lyons、Alison Brown,2008,《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地理学报》第2期。
- 李志刚、薛德升、杜枫、朱颖,2009,《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地理研究》第4期。
- 沃勒斯坦,伊曼纽尔,2006,《转型中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评论集》,路爱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萧敬,2006,《美国移民三种类别》,《21世纪》第9期。
- 许涛,2009a,《广州地区非洲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行动逻辑》,《青年研究》第5期。
- ,2009b,《广州地区非洲人社会支持的弱化、断裂与重构》,《南方人口》第4期。
- 赵延东、J. Pedersen,2007,《受访者推动抽样:研究隐藏人口的方法与实践》,《社会》第2期。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主要数据》([http://www. stats. gov. 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9_402722560. htm](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9_402722560.htm))。

- Abadan-Unat, N. 1977, "Implications of Migration on Emancipation and Pseudoemancipation of Turkish Wome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1(1).
- Boehm, D. A. 2008, "'Now I am a Man and a Woman!': Gendered Moves and Migrations in a Transnational Mexican Community."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35(1).
- Borjas, George J. 1994,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2(4).
- Chiswick, Barry R. 2008, "Are Immigrants Favorably Self-Selected? An Economic Analysis." In Caroline D. Brettell & James F. Hollifield (eds.),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New York: Routledge, Second Edition.
- Christopher, Winship & Larry Radbill 1994, "Sampling Weight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3(2).
- De Snyder, V. 1993, "Family Life across the Border: Mexican Wives Left Behind."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15(3).
- Douglas D. Heckathorn 1997,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Hidden Populations." *Social Problems* 44 (2).
- 2002,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II: Deriving Valid Population Estimates from Chain-Referral Samples of Hidden Populations." *Social Problems* 49.
- 2007, "Extensions of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Analyzing Continuous Variables and Controlling for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37.
- Douglas, S. Massey & Kristin E. Espinosa 1997, "What's Driving Mexico-U. S. Migration? A Theoretical, Empirical, and Policy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4).
- Frost, S., K. Brouwer, M. Firestone Cruz, R. Ramos, M. E. Ramos, R. Lozada, C. Magis-Rodriguez & S. Strathdee 2006, "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 of Injection Drug Users in Two U. S. -Mexico Border Cities: Recruitment Dynamics and Impact on Estimates of HIV and Syphilis Prevalence." *Journal of Health* 83(6).
- Gelman, Andrew & Jennifer Hill 2007, *Data Analysis Using Regression and Multilevel/Hierarchical Model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el, S. & Matthew J. Salganik 2009,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as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Statistics in Medicine* 28.
- Gordon, E. 1981,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the Lives of Women in Lesoth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7(3).
- Greenwood, Michael J. 1971, "A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igration to Urban Areas of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ase of India."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1.
- Grubel, Herbert B. & Anthony D. Scott 1966, "The International Flow of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
- Kalbfleisch, J. D. & R. L. Prentice 1980,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Failure Time Data*. New York: Wiley.
- Keifer, N. M. 1988, "Economic Duration Data and Hazard Func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
- Liang, Zai, Miao David Chunyu, Guotu Zhuang & Ye Wenzhen 2008, "Cumulative Causation, Market Transition, and Emigration from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4.

- Massey, Douglas S. 198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4.
- 1990a,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Immigra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10.
- 1990b, "Social Structure, 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the Cumulative Causation of Migration." *Population Index* 56.
- 1995, "The New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1.
- Massey, Douglas S., Rafael Alarcón, Jorge Durand & Humberto González 1987, *Return to Aztlan: The Social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Western Mexi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ssey, Douglas S.,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 J. Edward Taylor 1993,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13).
- Nelson, J. 1976, "Sojourners Versus New Urbanite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emporary Versus Permanent Cityward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4.
- Petersen, William 1958, "A General Typology of Migr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3).
- Salganik, Matthew J. & Douglas D. Heckathorn 2004, "Sampling and Estimation in Hidden Populations Using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34.
- Schonlau, M. & E. Liebau 2012,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The Stata Journal* 12(1).
- Singer, J. D. & J. B. Willett 2003, *Applied longitudinal Data Analysis: Modeling Change and Event Occurren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alker, Peter 2001,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xford, UK: New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 Stark, O. & D. Bloom 1985,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 Stark, O. & J. E. Taylor 1989,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mography* 26.
- 1991, "Migration Incentives, 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101.
- Taylor, J. E. 1986, "Differential Migration, Networks, Information and Risk."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4.
- 1987, "Undocumented Mexico-U. S. Migration and the Returns to Households in Rural Mexico."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9.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责任编辑: 张宛丽

Democratic Planning for Freedom and Social Techniques: An interpretation of Mannheim's later sociology *Guan Feng* 89

Abstract: Mannheim's later sociology, with the theme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democratic planning for freedom, has a great deal of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However, it has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and has received lots of misunderstandings. Mannheim argues that social planning itself is neutral, and it not only does not conflict with freedom and democracy, but also is internally and mutually compatible with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e realization of democratic planning for freedom and social reconstruction depends on social techniques. Among them, education and the separation and counterbalance of the three powers of modern parliament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Mannheim's later sociology has produced extensive influences, and it has valuabl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social transition.

Informal Institution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 village *Wen Yingying* 113

Abstract: Most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ly focuses on how the provision institution or the democratic institution affects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while few researchers recognize that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 in rural China may affect public goods provision as well.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T village, this paper seek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l institution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T village, such as various customs and traditions,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public goods provision through the functioning of "social habitual memory" and "the alternate system".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s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public goods provision by improving villagers' donation in T village.

African Immigration in Guangzhou China: A cumulative causation perspective on immigration behavior *Liang Yucheng* 134

Abstract: This study tries to test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articularly the theory of cumulative causation, by examining the causal mechanisms of interna-

tional migration behavior of African foreigners in China. Since the African immigrant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is a hard-to-reach group, so 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 (RDS) method was employed and 648 samples was collected in two immigrant communities.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igration behavior of African foreigners in China between 2005 and 2011 has 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stage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study also illustrates that the cumulative causation of migration is an important dynamic in migration, and its effect has been increasingly enhanced. Therefore, as long as China's economy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the society keeps stable, the next wave of illegal immigrants w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itself and expand rapidly.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uplift the social strata of the African foreigners coming to China by restraining the speed and the scale of the flowing-in immigrants from the lower strata.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 Status Attainment,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Zheng Bingdao & Wu Xiaogang* 160

Abstrac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ukou*)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China. However, the existing empirical literature is fragmented, dealing with either the economic status and social wellbeing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or the impact of the selective mobility of *hukou* status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outcomes. Pooling the data from three CGSS surveys (2003, 2006, 2008), we integrate the study of rural-origin people's socioeconomic mobility and the role played by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hukou* changes of rural status. Specifically, we differentiate those who gain urban *hukou* status due to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ir villages into cities from other successful urban *hukou* obtainers, and compare their earnings with rural migrant workers who fail to obtain urban *hukou*.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monly observed earnings premium of urban *hukou* is limited only to a subgroup of rural-origin people who obtain their urban *hukou* through a highly selective process. Propensity-score matching analyses also demonstrate that the effect of urban *hukou* on earnings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pensity of *hukou* conversion. The findings further show that urban *hukou* only pays off among people with high education and advantaged occupations in the state sector. Our research findings shed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ity processes and stratification outcomes, and bear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reform of *hukou*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